

▶▶▶ [上接 A3 版]

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建议书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贾根良



由于目前经济学本科生教学的教学时数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因此,只能通过减少过分膨胀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来加以调整。在我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中级甚至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这些更高深的课程。因此,这些中、高级的本科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些课程的1/4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3/4用于经济学方法论并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课程的教学。这样,在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上,西方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就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样化发展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有多种途径,这里只讨论其多样化发展就是反对固步自封,倡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相互容忍和宽容,鼓励创建新的学派并编写具有不同风格的教科书,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等学校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但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吸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前者没有,但却与后者具有共同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例如,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构成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有流派的基础,它是在马克思的先驱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对这种发展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一直存在着争论。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更遑论像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那样做出创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也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仍青睐有加,而对历史方法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却视而不见,甚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视作“旁门左道”,只要一谈西方经济学,就言必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以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误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失去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这个非常重要的同盟军,而且

也拒绝了对其理论创新最能提供借鉴的西方经济理论,这反映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固步自封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被边缘化也是有其自身重要原因的。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多样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要巩固其地位,就不能局限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中,而应在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和应用经济学中扩大其影响,在这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借鉴和批判性吸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编写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教材为例,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材建设工程教材外,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这三门课程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编写的。但据笔者所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领域都有很多重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在批判、借鉴和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令学生们喜闻乐见的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包括国别经济概论)的教材。

第四,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

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搜集

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再多的数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在理论经济学中,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构成了经济学的三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研究传统,但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工作的大多数海归学者在海外所接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培养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不了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就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一个“补课”的问题,因为如果教师只知道这三种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的一种或两种,怎能胜任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的任务呢?例如,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有大量批判,但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并没有对其理论的局限性、缺陷做出评论,批判性教学更是无从谈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

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中都应该得到贯彻。对于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未来可能开设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基础性课程的教师来说,他们都应该能够胜任这三门课的教学。为了保证批判性教学的方式得到切实的落实和提高,每位教师在长期从事这三门课任一门课程教学之前,至少应该有其他两门课程中一门课程的三年教学经历。具体地说,由于短期内在我国高等学校不可能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应该至少从事三年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反之亦是,这种“轮岗”应该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一种制度性要求。经济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或理论传统不仅存在于理论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而且大量存在于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地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得到

根本性保证的措施是编写并使用经济学的三种基本范式都能得到反映并进行比较分析的教材。

第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工具为核心。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工具为核心,在教学法上是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因为在对不同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性教学时,所针对的目标只能是不同的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所存在的优缺点,所谓以争论为核心的教学也只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不同理论范式的解释及其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优缺点展开的争论。

但在我国经济学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经济学教学是以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为中心的,这被称作是“数学形式主义”,即根据研究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了,而许多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教学和运用与现实问题并不相关,这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关系。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与观点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开辟道路,才能为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辟道路。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已经制度化,成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我国经济学教育应该吸取其教训,纠正目前已经过火的以工具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从根本上根除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支配。

第六,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的必修课程,实现方法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

针对数学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活动中的泛滥,加奎·萨皮尔曾经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如何认识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

在经济学中的适用范围,这涉及到经济学方法论或更一般地说涉及到科学哲学的问题,但在国内外经济学或科学哲学课程,这就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活动中的支配地位提供了制度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制度,但是只要它受制于持久的管制、合法性及其优秀的标准以及评价程序,它就被制度化了。……如果我们认为是方法论管束并设定了科学,那么由于它是由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使科学化的一套规则所构成的,所以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

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和科学观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支配局面,为经济学在理论、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其科学观来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类比于数学和物理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数学和工程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这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在经济学教育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导致了经济学远离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只承认数学形式主义是经济学唯一科学的方法,正如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托尼·森森指出的,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份稿件要想在主流圈子内被算作经济学(或拥有读者),作者就必须采用数学方法(或拥建读者),作为科学方法并已成为“数学建模”的同义语,甚至数学化的经济学知识才被认为是重要的。

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来说,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只是众多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们并不反对使用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但却认为它只是经济学的一种辅助研究方法,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利益分析的、统计学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因此,它们将经济现象看作是与社会、法律、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更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营养;相比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它们更看重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调研报告的价值,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新思想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科学观,经济学的研究开设应该是多元主义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开设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些选修课程,从而实现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化。这种科学观应该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除了开设作为必修课程的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部分选修课外,目前最值得注意是从社会学中引进定性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等。

(待续)
(原载《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上海人出版社2018年5月)

▶▶▶ [上接 A1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根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对象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之中的。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有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国家形态、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和根本来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完全不受研究者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影响。另外,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样也要揭示那些通行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普遍规律”,那就必须对于全部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为前提,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假说”的性质,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基于对全部人类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是主要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所以,把本阶级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国家形态、一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宣布为人类永恒的“普世真理”,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幻想和虚构,而且也是他们用以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

2.关于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

态总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总是更多地反映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不存在能够反映和代表所有不同阶级利益和诉求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如上所述,即使有人宣布自己的经济学是“普世真理”,也无法改变这一客观事实。显然,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产生于这些国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不从这样一个本质层面出发,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在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马克思学习。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批判继承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采取了一种科学公正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并且在理论上继承了他们所提出来的许多范畴,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充分揭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理论逻辑和范畴含义等多方面存在的错误和局限性,不仅创立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价值

实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生产价格、绝对地租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新范畴,而且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范畴和概念,也重新赋予其科学的含义。正是在继承又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创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做了重要的理论区分,他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政治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了经济学的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政治经济学则仅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历史来看,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两个重要事实影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批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推动了那个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二是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的大论争,直接导致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在此之后,不仅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

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且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理论上对抗资本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力,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核心理论任务。于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用效用价值论替代“危险的”劳动价值论。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他所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段时间内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1929-1933年“大萧条”的爆发,宣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失效,并催发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产生,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又持续陷入“滞胀”的泥潭,从而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于是,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英美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又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所谓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仍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期刊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再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普遍存在的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等各种客观事实充分表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更不是什么“普世真理”。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进一步证明,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除了继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

行改良主义的争吵之外,不可能提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良策和方案。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利用数学披上了科学的形式主义外衣,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因此,继续崇拜和迷信早已被实践证明并非科学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和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看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整体和认识其中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部分内容和可以借鉴的成分。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提出来的许多具体概念和理论,经过科学改造之后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我们既要反对全盘照抄照搬和盲目迷信当代西方经济学,也要反对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那种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为唯一科学的“现代政治学”,并据此反对中国人需要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完)